

人口比例与移民控制

朱 翊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030)

摘要:当代,移民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是什么导致了移民流入国的移民控制政策强度变化呢?本文认为,在无紧急状态的情况下,人口比例的失衡是产生限制移民政策出台的主要压力,这种压力直观而迫切,在移民流入国的本土国民中产生丧失预期优势的恐惧情绪,这种恐惧情绪会在当地居民中被放大,它所产生的社会压力导致控制移民政策的强度不断加大。

关键词:移民;人口比例;恐惧;移民控制

中图分类号:F323.0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背景和提出

在人类产生后的漫漫历史长河中,迁徙活动就成为人类生存与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让人类发现更好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机遇。古代人类的迁徙,或是因为狩猎和放牧,或是因为战乱和疾病,或是因为政治经济中心的迁移。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殖民活动将人类的移民活动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移民人数剧增(土著人沦为奴隶而遭贩卖,欧洲殖民者的迁移),移民的范围大大扩展(欧—亚、欧—美与欧—非航线)。19—20 世纪,人类的移民运动继续发展,在规模和地区范围方面都进一步扩大。到 20 世纪末,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掀起了新一轮的移民潮。

在解读当代的移民问题时,我们不得不了解这样一个背景:从 20 世纪初开始,移民运动就告别了自由移民时代,一直置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1]然而,正是因为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立了国家主权独立和不容干涉这一基础,使得全球性的移民问题面临着巨大的矛盾。正如德文登在《国家边界的开放中》所阐述的,移居国外是一个人权的问题,人们有权利追求更好的生存环境或者是逃避灾难;然而,移民入境却被视为一个国家的主权问题(入境与居留)。但如果人们可以自由地离开自己的国度,那么他们又能去哪儿呢?^[2]别的国家往往会将移民潮视为一种威胁,这一威胁体现在政治层面(对国家稳定和安全的冲击)、经济层面(损害国家福利制度)和文化层面(对民族属性和本土文化习俗的冲击)。因此,目前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国家——尤其是几乎全部的发达国家,都通过各种移民政策来控制移民的流入,防止非法移民。但我们通过观察不难发现,不同的国家所设立的移民控制政策的强度是不同的,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所制定的移民控制政策的强度也有相当大的变化,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移民政策强度的变化呢?本文试图来回答这一问题。

二、学界已有的一些解释

学界对于移民控制政策强度的变化已经有了一些研

究,他们大都从经济、文化等角度来进行解读。这些不同角度的解读都有其自身的解释力,但也多多少少存在着一些问题。

从经济角度解读移民控制政策的强度变化主要将论点集中于移民所带来的经济冲击,如失业、低薪等。罗伊·贝克(Royal Beck)在他的著作《反对移民》(The Case against Immigration)一书中认为,移民带来了工资待遇的降低,引发了经济的不平衡;他们不仅从下层劳动力(尤其是黑人)那里抢走了工作机会,更因为移民给福利系统带来的压力,使得一般民众的生活质量都降低了。正是这些经济压力促使了反移民政策的出台。^[3]布维尔(Bouvier)也认为,正是由于移民夺走了下层阶级的原有资源,并且移民将经济转向一种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使得移民接纳国必须对此做出反应——控制移民。^[4]而 Scheve 和 Slaughter 则认为,正是移民对劳动密集型工作的抢占,使得非熟练工人和失业工人比高技术工人和有一定资金的市民在反对移民的态度上更激烈。^[5]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经济的原因并不是很有解释力。比如,Borjas 就认为,移民因为填补了移民流入国劳动力缺口和纳税等,给移民流入国带来了更好的经济效益。^[6]Simon Hix 和 Abdul Noury 则认为,在移民政策的控制强度方面,政治家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偏好比他们自己的或者选民的经济利益起着更大的作用。^[7]实践中我们也能找到案例来证明经济角度的解释仍有不足。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爆发后,美国一度出现了经济的萧条和衰退,国内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人口,然而此时的美国仍然继续采取宽松的移民政策,引进了大量的移民劳动力。可见经济既不是一个必要条件,也不是一个充分条件。

从文化冲击的角度来解读移民政策变化的压力,则将目光聚焦于因移民对流入国种族、文化的挑战和破坏而导致的安全压力。A. Riding 认为,正是因为移民在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上的差异,使得当地人由不满而导致排外,甚至是发生种族暴力。^[8]Blumer 则告诉我们,当个人预期外来者很有可能威胁到他作为当地人的优势地位时,他对群体地位的不安全感尤为敏锐。^[9]而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则通过《文明的冲突》来说明不同文化背景所造成的民族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当这种冲突突破了地域的限制而直接面对面的时候,冲突将会激烈而持久。911 事件的发生,就是文化冲突极端爆发的一个重要例证。在 911 事件后,美国对边界的限制以及对移民控制的强度都大大地提升了。不仅仅是美国,近十年来,越来越多先进的工业国家把移民问题看作是一个重要的安全问题。^[10]甚至如 Boswell 等学者认为,政府通过实施强有力的移民控制政策,可以展现国家作为安全提供者

的能力,以提高政府的威信。^[11]但是文化角度的解释,却也面临这样一个困境:文化是否具有相互包容和融合的能力?如果有,为什么在移民与当地居民中不能发生,进而促使他们彼此包容、相互融合?如果没有,那是否意味着移民带来的文化冲击是不可解决的?那又如何解释美国各大城市中黑人社区和唐人街的存在呢?

三、本文的看法

笔者认为,在从经济和文化角度来解释控制移民政策强度变化都有所欠缺的情况下,从人口比例这一角度来解读移民控制政策强度变化的问题,似乎颇有研究的空间。霍洛维兹(Donald L. Horowitz)在考察种族冲突的时候,通过大量的案例,发现种族冲突的产生源自于个人对所处种族群体范围大小的感知。当预见到种族人口对比发生不平衡变动时,就会产生对外来种族的恐惧而滋生心理和行为上的排外。^[12]而人口对比的不平衡变动对于研究一国移民控制政策强度的变化而言,无疑是一个不错的视角,能更有利于解释为何会产生社会中反对移民的压力。而本文正是受此启发。

本文中所举的人口比例这个自变量,指的是移民流入当地居民所感知的当地社群人口与外来移民及其母国人口的对比。而应变量是社会所产生的对移民的排外压力。而笔者认为,这其中还有一个中间变量,就是对丧失预期优势的恐惧。预期优势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它既包含了当地居民在社会资本方面的优势,也包含了他们对本土文化和风俗的一种优越感。在一般情况下(后文将对此做一些说明,即排除一些特殊紧急状态),当移民流入当地居民感知到当地的社群人口与外来移民人口和外来移民母国人口的平衡比例被打破时,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对丧失预期优势的恐惧,而正是这种恐惧所产生反对移民的压力促使了国家移民控制政策的强度不断加大。

首先,人口比例这个自变量有着较为直观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感知和获取两个方面。一方面,人口比例的变化会比较直接地被当地人所感知到,每当他们在上下班的途中、参与社区的活动中、以及日常购物和娱乐中,都能感知到身边是否有一些跟他们不一样的人出现在他们生活的范围里。当地人对有些移民的感知并不需要交流,因为他们的肤色、相貌、衣着就能与当地的居民区别开来;对于同一或相近种族的外来移民(即那些让当地居民难以从外表上区分是否是移民的人),通过交谈、口音、对当地情况的熟悉程度也可以发现而加以区别。正如 Helen Kopnina 在《East to West Migration: Russian Migrants in Western Europe》中所提到的: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俄罗斯的“新移民”们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个当地人,或者是欧洲其他国家的游客,但一旦他开口就会被当地人识破。^[13]所以,这种感知是日常发生的,其感知的频率比较高,而且它又是当地居民亲眼看到或亲耳听到的,属于直接的亲身感受,感受的强度也会相对较高。另一方面,人口比例相比于劳动密集型经济的成型、平均报酬的降低、文化意识形态的冲突而言,是一个对比直接而难以隐藏的数据,平民可以从报纸、电视和网络媒体上非常便捷地了解到,民众无论在个人对此类数据的获取能力

方面,还是在获取的渠道方面都没有什么障碍。况且人口比例这样的数据往往都是媒体、社会团体和政党关注和博取关注的要点之一,因此民众获取本国或者本地区的国民人口与外来移民人口的比例数据是相对容易的,而且在理解方面也要比诸如经济成分、文化冲突等概念更容易理解

其次,人口比例的失衡是丧失预期优势的心理恐惧感的主要来源。关于种族歧视的相关研究告诉我们,对于现有的居民种族群体而言,当他们面临着外来移民的迁入时,都会产生一种因为陌生而带来的不安全感(其实这种感觉是彼此造成的)。如果政府部门比较衰弱,不能有力地应对因为移民的涌入而导致的各种问题,那么现有居民种族群体的不安全感会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当外来移民的涌入数量多或者发生突然,也会造成现有居民种族群体的不安。根据这一研究结论,我们可以推论认为,当外来移民的迁入还比较少的时候,由于现有居民本身掌握的社会资本的优势,使得现有居民处在一个优势地位而外来移民处于劣势地位。而当外来移民大量涌入,造成现有居民与外来移民的人口比例失衡的情况时,外来移民会形成自己的社会人际网络,再加上外来移民通常比一般的现有居民工作更加努力,这就造成现有居民认为自己原有的预期优势正在丧失。这种认为自身以及所在的现有居民群体将在未来丧失优势的心理,会使得他们产生恐惧,从心理到行为上厌恶乃至排斥外来移民。Herbert Blumer 研究认为,外来者的到来会威胁到现有居民人群“占有某些优先权和优势地位的优越感”,这种感觉对种族间恐惧和敌意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发现,当一个人预期外来者很有可能“逾越种族排他性的界限”时,他对群体地位的不安全感会变得尤为敏锐。^[14]

第三,当现有居民认为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的人口比例产生不平衡的情况即将到来时,他们所产生的对预期优势逐渐丧失的恐惧感,将会使得他们不但把人口比例不平衡所带来的威胁感和恐惧感放大,更有可能造成他们主动采取一些措施来迫使移民减少流入或者是再重新移出。中俄在波格拉尼奇内小镇上发生的移民工人冲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波格拉尼奇内属于俄罗斯的滨海边疆区,是中俄边境上的俄方领土上的一个小镇,因为中俄贸易而发展起来的出入境口岸。其对应的中国方面的口岸就是绥芬河口岸。20世纪60年代,波格拉尼奇内原有的俄罗斯居民大约2万人,中国移民只有数百人,当地居民与中国移民的人口比例在0.5%左右。90年代以来,由于中俄边境贸易的不断发展,许多中国工人来到波格拉尼奇内小镇谋求工作。到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本土居民增长到近3万人,而同时,在此居留的中国移民工人大约有3、4千人,占人口总数的10%以上。面对如此巨大的人口比例反差,当地俄罗斯居民的反移民情绪日益高涨。在2000年,这一地区发生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移民工人的摩擦,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当地俄罗斯居民在人口比例失衡的情况下,产生了“中国人即将充斥该地区”的恐惧——难以想象2730平方公里的面积竟然会被3、4千中国工人充斥?况且,即便把这些被中国移民工人所占据的工作岗位提供给俄罗斯人,也只有(下转174页)

从事轨道交通的生产、研发单位按照“自愿、平等、合作、互助、互惠”的原则加入。

(三)加强对基地建设的资源集聚

加快建设常州轨道交通产业园,以“一园两区”的模式整合戚墅堰区和武进区的轨道交通产业资源,以戚机厂和戚研所为龙头组建产业园北区,以今创集团和常牵中心等单位为核心组建产业园南区,对入园企业给予统一的政策扶持。通过产业园规划建设,集中集聚优质企业,加快形成“一园两区多重点”的基地发展新格局,快速做强做大产业规模。发挥技术力量雄厚,关键零部件制造方面的优势,围绕整车生产和轻轨建设的目标,分工协作,共同完成,走出常州轨道交通产业跳跃式发展的关键一步。

1.建立江苏常州轨道交通研究院

由常州和西南交通大学共同在常州科教城组建,2009年9月举行了揭牌仪式。研究院将依托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重点实验室强大的科研力量,对国内外轨道交通最新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在车体集成、电气控制、牵引传动、制动、信号系统等方面通过自主创新,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轨道交通产品国产化。走出一条具有常州特色的产学研合作道路,使更多的轨道交通科

技成果在常州成功转化和实现产业化。

2.建立非金属材料防火检测中心

在轨道交通的配套和附件这一领域,包括工程塑料、车用玻璃钢、橡胶密封件、车用五金装饰件、无卤低烟低毒耐火阻燃材料和内装饰用阻燃或燃烧无毒纺织品等,国内迄今为止既没有能出具国际公认检测报告的相关机构,也没有得到相关国际机构互认的检测单位,中心的建立将能弥补这一空白。

3.建立戚机公司机车震动实验室

该实验室针对机车的上线运行试验现存实验方式的缺点而设计,建成后可以模拟机车实际运行中将会遇到的各种环境,充分收集数据。它的建成使用将有力的推动我国机车设计生产水平的进步。

参考文献:

- [1] 曲婕.天津市汽车零部件出口基地战略发展研[J].汽车工程师,2010,(01):76-78.
- [2] 蓝必华.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实践与对策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03.
- [3] 吴鹏.入世对上海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上海:上海财经大学,2000.

(上接 181 页)少数的当地人愿意接受这些岗位。^[15]这也说明了当这种移民恐惧情绪蔓延时,威胁感会被极度放大和叠加。而根据政治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在两个群体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时,被挑战者往往会采取先发制人的反击,来压制和打击挑战者不断增强的实力。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如果那些外来移民群体不断增大,就会扩大他们的能量,提高他们的地位,他们早晚会当地人造成威胁。既然威胁不可避免,那就要趁着比对手还强大很多的时候来解决问题。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地区的人口平衡被打破,但当地居民仍占有极大的群体数量时,往往是当地居民首先挑起争端。在上面的案例中,在加上中俄两国在 1990—2000 年间人口、综合国力的对比(中国的基数和增速都要超过俄罗斯),也会使得当地居民对中国移民的恐惧加深,排斥移民的呼声日益高涨。

所以,当移民流入国的居民感知到当地居民与外来移民原有的人口比例平衡被打破时,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对丧失预期优势的恐惧。虽然实际的情况往往并非很严重,但当地居民却常常会夸大这种威胁感,加深对丧失预期优势的恐惧感。而正是这种恐惧感一方面产生了反对移民的呼声和压力,使得国家移民控制政策的强度不断加大;另一方面,在这种恐惧感的笼罩下,当地居民却往往会基于现实的考虑,首先挑起争端,而争端一旦被挑起并引发全国的关注,则政府将受到更多的加强移民控制的压力。

四、两点说明

本文所指的这种当地居民和外来移民人口比例的失衡而引发移民控制力度的加大,指的是一般情况下;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这样一种因果关系不一定成立,或者其解释力将大大减弱。很好地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的 911 事件。美国是一个移民大国,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有机会移民到美国,而

之前美国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和文化多元的社会环境为移民提供了很多便利。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移民美国的比例保持在一个平稳上升的状态,大约年增长率 3%,2009 年调查数据显示,过去 10 年在美国的穆斯林和阿拉伯移民大概有 350 万人。^[16]而 21 世纪以来,墨西哥移民和中国移民是美国移民来源的前两位。2007 年的数据显示,墨西哥移民占到了移民总数的 31.3%,当年美国的墨西哥移民大约有 1170 万,占有所有移民的半数以上。而同年在迁往美国的中国移民人数达到了近 220 万。^[17]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移民增长率来看,墨西哥和中国都应该是美国本土居民产生反移民情绪最高的两个国家,而对穆斯林国家的反移民情绪应该比较低。按照人口比例失衡的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应该加强对墨西哥和中国移民的控制力度。然而 911 事件以后,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安全政策,如《国土安全总统令 2 号》、《通过移民政策对抗恐怖主义》、《美国爱国法案》等等,大部分都涉及到了移民控制问题。在控制移民的政策和实际操作中,我们却发现整体加强移民控制的表象下,对来自穆斯林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民众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移民限制措施。在这类特殊的情况下,人口比例失衡将不再是主要的限制移民的驱动力。

目前本文的架构更多的是基于因果机制的逻辑推理上,尚没有对“人口比例失衡”这个关键变量进行系统的数据验证,而且即便在逻辑上,也还有不少的欠缺。比如:人口比例失衡的拐点大概是多少?跟历史上本土居民和外来移民的人口比例是否有关系?对于移民国家而言,跟不同国家的人口比例在对比中是否会出现绝对数和增速的反相关?等等。所以,只能说本文是笔者在国际移民问题的研究方向上的一些准备和思考。